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10220061150064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两种叙事模式：“革命”与“故鬼重来”
——概念的缘起、发展及其影响

Two narrative modes: "Revolution" and "Revival Ghost"
——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se two
concepts

林建刚

指导教师姓名: 郑楚 副教授

专 业 名 称: 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09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09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09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09 年 5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

内容摘要

“革命文学”一直是现代文学界研究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张爱玲、沈从文、周作人等作家文学作品的不断重新出土，这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文学家的创作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是对于两者，通过抽取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来进行比较研究的研究论文还比较少，而这正是此文的着力点之所在。与此同时，通过对文学叙事模式的梳理，本文也考察了其对于文学史写作思路的影响，并对这两种模式的利弊得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也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学史的写作。

全文分为了三个部分：

本文第一章首先通过对丁玲、蒋光慈以及赵树理等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概括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文学叙事传统，并分析了革命文学在其形成之后所形成的弊端。

第二章通过对周作人、张爱玲和沈从文作品的解读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故鬼重来”的自由主义文学叙事传统，并通过自由主义文学背后的思路来展开对于革命的反思。

第三章则是在第一二章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叙事背后对于文学史写作思路的影响，追溯了“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这两种叙事思路对于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影响，通过对夏志清、司马长风等文学史思路的叙述，展开了不同于大陆文学史叙事思路的另一种文学史写作思路，由此最终形成了海外和大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史写作思路，这两种文学史思路彼此之间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补充，各有其利弊得失。最后，借用了哈耶克对于理性的两种不同的区分和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主要揭示在各自的文学史思路的背后，是思想史上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导致的，这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发展到后来，最终导致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两种结局。积极自由可能导致人的奴役，消极自由则会带来人的解放。

关键词： 革命文学；故鬼重来；文学史叙事

Abstract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has always remained a hot issue in the modern literary study. However, with the com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those literary works by Zhang Ai-ling, Shen Cong-wen, Zhou Zuoren have also received adequate research. As for these two types of literary work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common narrative mode has been rarely touched upon.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o take this challenge. Meanwhil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orting out different narrative modes in literature,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how these modes have influenced the thinking patterns in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so as to reveal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rom a personal perspective, which thus will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is devoted to the analysis of those representative novels by Ding Ling, Jiang Guangci and Zhao Shuli as well as these writers' life so as to summarize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veal its weakness after its formation.

The second chapt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liberal narrative tradi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ose literary works by Zhou Zuoren, Zhang Ai-ling and Shen Congwen. The underlying idea that promoted the liberal literature will trigger a reflection over the revolution as well.

After the overview in the first two chapters, Chapter Three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narrative modes o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paper will also trace their influence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liberal literature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ose writings on history of literature by Xia Zhiqing and Sima Feng will be taken as case studies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narrative modes and thinking patterns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in the oversea areas.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se two modes of narration are complementary rather can contradictory. They both have their disadvantage.

Then, the paper proceeds to section to demonstrate Hayek'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sm and Berlin's view on the two concepts of freedom: "positive freedom" and "negative freedom". These will help to reveal that it is the difference in rationalism that results i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hinking patterns that underling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types of rationalism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positive freedom and negative freedom respectively. Positive freedom could bring slavery; whereas negative may bring emancipation to people.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 Revived Ghost; The History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革命”叙事模式的缘起：从家族革命到社会革命及其反思	3
第一节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少女出走后的双重苦闷	3
第二节 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爱情与革命的抉择	7
第三节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革命的人被革命	12
第二章 “故鬼重来”叙事模式的缘起：从家族到社会的“故鬼重来”	16
第一节 周作人思想转变以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解读	16
第二节 张爱玲《金锁记》：家族式的遗传病	20
第三节 沈从文小说《萧萧》：摆不脱的人生道路	25
第三章 “故鬼重来”与“革命”的模式：对文学史写作思路的影响	28
第一节 “革命”叙事模式对于文学史写作思路的影响	28
第二节 “故鬼重来”叙事模式对于文学史写作思路的影响	33
第三节 不同的文学史叙事思路的影响及背后的思想史动因	38
结 语	42
参考文献	44
后 记	46

Contents

Prologue.....	1
Chapter 1 "Revolution" the origin of narrative pattern: from the family revolution to social revolution and its reflection.....	3
Section 1 Ding Ling's "The Diary of Ms. Shafie": The double depressions after young girls running away from home.....	3
Section 2 Jiang Guangchi's "The Moon out of the Clouds": The Game of Love and Revolution	7
Section3 Zhao Shuli's "The Marriage of Xiao Erhei ": The one who want to kill the others was killed	12
Chapter2 "Revival Ghost" the origin of narrative pattern:from family to society, "Revival Ghost"	16
Section1 the changes of Zhou zuoren's thought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literature'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16
Section2 Zhang Ailing's "Golden Lock":Family of genetic diseases ..	20
Section3 Shen Congwen's "Xiao Xiao": The life can not get rid of	25
Chapter3 "Revival Ghost" and "revolutionary" model: the impact on the writing ideas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28
Section1 "Revolution" narrative mode of 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for the impact of ideas	28
Section2 "Revival Ghost" narrative mode of 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for the impact of ideas	33
Section3 Different ideas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behind the cause	38
Conclusion	42
References.....	44
Postscript.....	46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革命文学作为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文学形式，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并且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学术著作，在大陆学术界有王烨写的《二十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形式》^①海外学者陈建华也写过《“革命”的现代性》^②和《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③等学术著作。

与此同时，在革命文学这一文学主流背后，还有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的支流。与革命文学强调阶级性不同，自由主义文学强调的是人性以及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个人自由。1980年代之后，随着夏志清等人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有关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在大陆也得到了有效的进展，曾经一度出现过沈从文热、张爱玲热、周作人热等等，在这方面，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④曾系统地研究过沈从文，余斌的《张爱玲传》^⑤是比较早对张爱玲进行全面研究的学术著作，而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⑥则比较早的开启了对周作人的全面研究。

在革命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研究都比较兴盛的时候，对于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将两者系统地贯穿起来使之成为相互映照的对象，然后加以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更少，更重要的是，革命文学形成的背后所构建的文学史思路和自由主义文学形成背后的文学史叙事思路，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梳理，而这正是本文所着重用力之处。

本文的学术灵感来自两个方面：首先，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1](P188)}，在这篇演讲中，余英时提出了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演变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并由此开启了1990年代反思激进主义的滥觞。余英时在演讲中着重的是中国百年来的思想史，而本

① 王烨：《二十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形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③ 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④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1985年。

⑤ 余斌：《张爱玲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⑥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文所思考的方向则是这种思想史上的激进思维在文学史中是如何得到体现并最终形成的。用自由主义的文学作品展开对于革命文学所表现的激进主义的反思，是本文着重用力之处。

另一个学术灵感也是来源于 1988 年。在这一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中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2]，并付诸实践，对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系列经典性作家及作品，如柳青的《创业史》，茅盾的《子夜》，赵树理方向，丁玲的小说等等，进行了重新解读。本文第三章所着重论述的也正是侧重于重新梳理文学史写作中的两种不同的叙述思路。有了对文学史思路的梳理与掌握，才有了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最后，本文则运用了哈耶克与以赛亚·伯林的概念，指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史思路背后的思想史源流，而这两种不同的启蒙路径，其实恰恰就是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不同之处，也导致了不同的后果与结局。

第一章 “革命”叙事模式的缘起：从家族革命到社会革命及其反思

“革命”的叙事模式：就是“儿子革老子命”的叙事模式，指的是在现代文学的叙事模式中，后一代人的命运总是背叛前一代人的命运，其历史观为历史的进化论。典型的代表是“五四”时期易卜生的剧作《娜拉》，在这部剧作中，开始娜拉是她的丈夫的小宝贝、小麻雀，后来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娜拉终于觉悟，她从来不是她自己的，而只是他丈夫的宠物，于是，她离开家庭，做她自己。这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可算作这种叙事模式的前奏，“娜拉出走”的家庭革命正是社会革命发展的前提。这里的革命主要是五四的伦理革命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用“儿子革老子命”来形容这种叙事模式，乃是因为“五四”时期鲁迅在其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到：“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3](P129)}这种革命的叙事模式，在一开始表现为家族革命的叙事模式，后来则表现为阶级革命的叙事模式。本章主要通过解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加以具体阐述论证。

第一节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少女出走后的双重苦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易卜生戏剧《娜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掀起了一股妇女解放的浪潮，按照传统的文学史的表述，是妇女解放。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形并不是妇女解放，而是少女解放。^①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对象，其主体并不都是当时的妇女阶层，而大多是学生阶层，因此，表面上是妇女解放，其实际情形则是少女解放，这从胡适模仿易卜生的戏剧所写的《终身大事》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主要情形是少女离家出走，要求摆脱家族式

^① 关于“五四”时期妇女解放与少女解放的区别，笔者是在林丹娅老师的学术讲座中听到的，可参看林丹娅发表在《东南学术》2004年第一期的《女性话语的文学境遇》。

的包办婚姻。“妇女”与“少女”仅仅一字之差，但其实质却截然不同。如果说是妇女解放，那么意味着其已经组建家庭，其出走仅仅意味着追求自己的独立与自由，而少女则不同，其身份在一开始就意味着她是大家族的一个成员，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其权利意识的觉醒，她们的离家出走才意味着对家族制的背叛与革命。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所表现的恰恰就是在少女解放过程中的困惑与迷茫。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少女的离家出走跟当时的男青年一样，一般会遭遇郁达夫似的双重苦闷：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首先是生的苦闷，当青年学生离家出走背叛家族的时候，虽然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但是一旦没有经济来源，那些离家出走的青年就会陷入生的苦闷，这也就是鲁迅之所以写《娜拉出走以后》这篇文章的立意所在。在没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离家出走的代价是很难依靠自己的努力而生活下去，在这里，青年学生面临一个“怎么办”的问题。不仅如此，生的苦闷还意味着对于人生意义的怀疑与探寻，对于人生道路的自我设计与浪漫想象。其次是性的苦闷，青年学生的离家出走，从年龄结构上来讲，一般已经到了青春期，也正因为到了这一年龄，其家族才会进行强制性的包办式婚姻。在这一时期，离家出走的青年对于“爱情”与“性”比较敏感，与此同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人性所固有的欲望，这就构成了在漂泊生涯中的另一种迷茫。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两种苦闷交织在“五四”青年一代身上，构成了那一代人最具鲜明的个性特征。

如果说郁达夫的小说所表达的是男性在这一时期的心声的话，那么，女性由于其固有的羞涩以及世俗的偏见等等，并没有充分的表达出来，但是，丁玲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情形，其《莎菲女士的日记》就充分表现出这一时期青年女性在漂泊过程中的双重苦闷。

先来说生的苦闷。这是“五四”时代离家出走一代人的共同表征，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也有一定的表现，这主要体现在莎菲的朋友蕴姐的信中和莎菲自己的肺病中。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蕴姐可以说是莎菲的真正知己，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莎菲在日记中写下的回忆；二是莎菲回忆写这些日记的原因的时候。在日记中，莎菲曾写到：“为了有蕴姐千依百顺的疼我，我便装病躺在床上不肯起来。为了享受蕴姐抚摩我，便因那着急无以安慰我而流泪的滋味，

我伏在桌上想到一些小不满意的事而哼哼唧唧的哭。”^{[4](P76)}不仅如此，莎菲在日记中也披露了之所以写日记的原因：“在新的忙乱中，我勉强竟写了这些日记了。早先是因为蕴姐写信来要，再三再四的，我只好来写。现在是蕴姐又死了好久，我好舍不得不继续下去，心想便是为了蕴姐在世时所谆谆向我说到一些话而便永远写下去做纪念蕴姐也好。”^{[4](P78)}仅次两点，我们就可以看出蕴姐在莎菲心目中的地位，但恰恰正是这个莎菲最好的知己，却过早的死去了，这对于莎菲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由此必然引起莎菲对于人生、对于死亡的过早思考，在接到蕴姐的信之后，莎菲的行为是：“足足有半年为病而禁绝的酒，今天又开始痛饮了。明明看到那吐出来的是比酒还红的血，但我心却像有什么别的东西主宰一样，似乎这酒便可在今晚致死我一样，我是不愿再去细想到那些纠纠葛葛的事……”。^{[4](P63)}从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莎菲对于人生的苦闷，另一方面，这段文字中提到的三种具体的意向也正是“五四”式的，典型地反映了“五四”时期多数小说的特征，那就是：酗酒、肺病、死亡。关于酗酒，不论是鲁迅反映知识分子苦闷的《在酒楼上》，还是郁达夫反映青年苦闷的小说《沉沦》，颓废时候的酗酒是必不可少的。肺病则是“五四”时代小说中最典型的病症，小说中这种大口吐血的细节描写，我们也屡见不鲜。而死亡，正是离家后无路可走的最后抉择，在小说中，除了涉及到蕴姐的死之外，还有几处提到了莎菲自己的死亡意向，一次是在此次喝酒之后，“我是在他们忧愁的低语中醒来的，我不愿说话，我细细想昨天下午的事，我闻到屋子中所遗留下来的酒气和腥气，才觉得心是正在剧烈的痛，于是眼泪便汹涌了。因了他们的沉默，因了他们脸上所显现出来的凄惨和黯淡，我似乎感到这便是我死的预兆。假设我便如此长睡不醒了呢，是不是他们也将是如此沉默的围绕着我僵硬的尸体？他们看见我醒了，便都走拢来问我。这时我真感到了那可怕的死别。”^{[4](P64)}另一次则是在小说的结尾，在自怨自艾的忏悔中，莎菲在日记中写到了在人生苦闷中的最后选择：“悄悄地活下去，悄悄地死去，呵，我可怜你，莎菲！”^{[4](P89)}因此，通过喝酒—肺病—死亡这三个具体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五四”时期小说所包涵的人生苦闷这一主题。

另一方面，《莎菲女士的日记》之所以引起文坛的关注，并不仅仅因为生的苦闷这一主题，“五四”时期的小说并不缺乏这样的主题，《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独一无二之处，主要还是因为丁玲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尤其是女性在性爱方

面的苦闷。性的苦闷，尤其是女性的性心理描写才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小说描写的主要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五四”时期女性在灵肉之间的矛盾。小说一开始是莎菲与苇弟之间的情感，在小说中，苇弟是一个深爱“我”的人，但是“我”却对苇弟没有任何的爱，主要原因是苇弟太老实，也不了解“我”，“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的去表现他的真挚”，“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我得清清楚楚。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4] (P48)}接着，在小说中，凌吉士出场了，“那个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男人的美上面”，“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却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风仪来煽动你的心。”^{[4] (P52)}可以说，小说中的“我”对凌吉士可谓一见倾心，于是在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中就有了如何接近凌吉士的行动以及与他交往，但是，令“我”失望的是，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发现了真实的凌吉士：“真的，在他最近的谈话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怜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青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是什么？是那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嘴抽着烟，同朋友们任意谈笑，还把左腿叠压在右膝上；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4] (P71)}而这，对于一个高度重视精神交流精神恋爱的“我”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就产生了失望，并有了摆脱凌吉士的打算，可是，每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的样子，“我”又总是禁不住去想念他的肉体，渴望被他抱着。在这里，最典型的体现了“五四”时期的女性在爱情与性爱上的矛盾心理，对肉体充满渴望而又有一种犯罪似的害怕，对精神交流要求极高，渴望两个人在肉体与精神上双重的契合，但现实生活中要么有美丽的肉体而精神上空虚，如凌吉士，要么就像苇弟一样执着的爱“我”，而“我”却对他无动于衷，最终，小说的结局在凌吉士对“我”的一吻中结束，这一吻，意味着“我”内心欲望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我”在精神上的失败，在一种近似忏悔似的自白中小说结束。

综上所述两点，我们看到了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表达的双重苦闷，对此茅盾在《女作家论》中曾有深刻的论述：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

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声……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着”^{[5] (P434)}，茅盾的前一句指出的正是其生的苦闷，第二句指出的正是其性的苦闷。

面对这双重苦闷，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也就是如何去解决这双重苦闷的问题。由这部小说所表达出来的作者的苦闷，通过反向思考，我们也就知道了莎菲（丁玲）在当时情况下渴望的一种生活状态：婚姻自由，生活自由，没有压迫，有一个在精神上充分理解自己非常喜欢自己而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人。有一群共同信仰的朋友，朋友之间相处的很融洽，彼此亲密无间。而当时的历史情形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遇，那就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生活，而丁玲以后所走的道路，也恰恰就是这样的道路，胡也频在后来的小说《同居》中描述了这样的生活梦想：“妇女们更快乐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像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她们生下来的儿女也由‘公家’保育，不要自己担心。”^{[6] (P676)}就这样，离家出走的“五四”青年在背叛了家族，历经了家族革命之后，为了解决人生的苦闷，走向了社会革命的道路，后来的丁玲与胡也频，其人生道路也恰恰如此。当他们走向社会革命的时候，这种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也就转变为革命时期的爱情与爱情时期的革命。

第二节 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爱情与革命的抉择

如上所述，“五四”时期的时代病是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而当时青年的解决方式就是革命与爱情。革命解决了人生的苦闷，从此人生有了一种新的追求目标，爱情则试图解决性的苦闷。于是离家出走的家族革命最终转化为社会革命，这一过程也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程，而在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革命与爱情的关系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到底是爱情重要，还是革命重要，就成了革命文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爱情时期的革命与革命时期的爱情纠葛在一起，一直

困扰着当时的革命作家，而最典型的反映这一特点的是革命文学家蒋光慈。

以爱情与革命为主题的革命文学，在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模式：革命+恋爱。而形成这种模式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蒋光慈的中篇小说《野祭》，而《野祭》所反映的困境，恰恰就是爱情与革命的困境。小说是以倒叙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叙事过程，其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作为革命家的“我”住在一户章姓的房东家里，房东的女儿淑君在知道我是革命党之后爱上了“我”，并由此参加了革命党，而我对此却无动于衷，原因是觉得她不美，“浓眉，大眼，粗而不秀”^{[7] (P311)}。与此同时朋友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郑玉弦，“我越看越觉得她的朴素的美正合我的心意”^{[7] (P335)}，就这样交往起来了。可是，随着时局的发展，革命遭遇到了挫折，这时候的郑玉弦却离我而去了，与之相反的则是淑君，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于是小说的最后，“我”在淑君的墓前，忏悔自己没有爱上她却爱上了别人。在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小说中“我”的爱情的择偶标准与革命无关，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是到了小说的结尾，在爱情的选择上，“我”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其原因恰恰是因为郑玉弦的不革命与淑君的革命，由此可见，革命在爱情上最终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位置。

其实在此之前，蒋光慈的小说就已经开始了关于革命与爱情的探讨，在《一封未寄的信》中就曾有这样的话：“你爱我，莫非是因为发现了我是一个革命党人？莫非是看出来我有伟大的精神，反抗的魄力和纯洁的心灵？”^{[7] (P157)}如果说《野祭》中，作者提出了革命与爱情的抉择并最终开始倾向革命的话，那么其后期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则最典型的表现了这种革命压倒爱情的模式。在小说中，曼英作为一个学生，在柳遇秋的革命宣传下，跟自己的好朋友杨坤秀进入军事政治学校，在学校中，她渴望着通过革命来解放全人类，脑海中充满了关于革命的各种幻想。在政治军事学校，曼英遭遇了革命与性爱的矛盾。“偶尔在深夜的时分，如果她没有入梦，也曾想起男女间的关系，也曾感受到自己的年青的肉体和一颗跳动的心，开始发生着性爱的要求……但是当天一亮，起身号一鸣的时候，她即刻把这件事情都忘却了。她又开始和大家说笑起来，操练起来，讨论起来什么革命与反革命……”。^{[8] (P25)}在军事学校中，当有男同学追求她的时候，曼英想到的是：“她来此地的目的并不是恋爱，谈恋爱也就不必来此地……而况且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是革命青年们谈恋爱的时候吗？这简直是反革命……”。^{[8] (P27)}这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